

北方五省区师专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东杰
责任校对 陈震文

中国现代文学

叶 凡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12.625 字数: 300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610-0531-8

I·121 定价: 4.10元

五省、区师专教材编审协作委员会组成名单

主任委员：卢鸿德(辽宁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

副主任委员：陈谟开(吉林教委副主任)

孟 新(黑龙江教委副主任)

戴居仁(陕西高教局副局长)

徐文林(内蒙教育厅副厅长)

刘万泉(辽大出版社社长)

秘书长：康永祥(辽宁省高等教育局普教处)

副秘书长：张春光(辽大出版社总编室)

委员：言 林——房洪涛、韩力学、高新
黑龙江——王金栋、王启祥、张桥
陕 西——李新柳、赵举生
内 蒙——朱成德、宋本成、哈斯
辽 宁——张丽佳

前 言

为了改变师范专科学校多年来借用本科教材的状况,适应当前师范专科学校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急需,一九八七年四月开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陕西五省、区教委、高教(教育)厅(局)本着师专教材由师专教师编写的原则,联合组织五省、区师范专科学校的教授、副教授等骨干教师,根据国家教委制定的二年制师范专科学校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精神,结合师范专科学校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协作编写了中文专业的系列教材、教育理论课教材和选修课教材,共十四种,十六册。

专业必修课教材:

1. 中学语文教材教法
2. 现代汉语
3. 古代汉语(上、下册)
4. 写作
5. 文学概论
6. 中国古代文学(上、下册)
7. 中国现代文学
8. 中国当代文学
9. 外国文学
10. 形式逻辑

教育理论课:

11. 心理学
12. 教育学

选修课:

13. 书法教程

14. 演讲学教程

这套教材在编写中,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师专的教学实际;在内容和体系上与师专培养规格的要求及知识能力结构相匹配;在阐明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注意吸收本学科最新科研成果,使教材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先进性和科学上的适用性。其中一部分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

这套教材适合于师专、教育学院和业大、函大、刊大、电大等中文专科的教学,其中书法教程和演讲学教程还适合于其他各类高校的教学。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以文学史的发展为线索,以作家作品为重点,力求符合师专培养目标。各编第一章介绍该时期文学史,之后,辟专章评述本时期的“创作概况”,由于这种设计与国内通行的教学大纲体例相一致,因而增强了教材与教学过程之间的协调性。其次,本书吸收了近年来科研新成果,在抗战前期专章简述“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和“孤岛文学”,以解决近年来教学急需而其它新文学史又未曾载述,因而难于找到教学资料的困难。

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有:

蒋 燕——绪论 第一编(第二、四、五章) 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 第四编(第三章第三节)

郭文珍——第一编(第一章)

第二编(第一章)

叶 凡——第一编(第三章)

第二编(第三章)

第三编(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编(第四章第一、三、四、五节)

罗宗义——第二编（第二、五章）

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编（第二章）

赵玉泉——第二编（第四章）

第三编（第一、二章，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编（第一章，第四章第二节）

金 祥——第四编（第三章第一、二、四、五节）

此外，大庆师专赵兴茂老师也参加了某些章节初稿的部分编写工作。全书由叶凡、蒋满统稿，最后由叶凡定稿。

这次五省、区联合组织编写师专教材还仅仅是一种尝试，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教材中缺点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并希望能得到兄弟省市的支持和帮助。

五省、区师专教材编审协作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即新文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近、当代文学之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具有彻底革命意义的发展阶段。通常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起点，迄于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约三十二年历史。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特殊形态——艺术形态，既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它还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作用，呈现出相当复杂、活跃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十分突出地表现了上述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扎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壤，它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展现了这一革命历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历史演变规律，它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堪称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面镜子。其鲜明的革命性、人民性、现实性，又充分地显示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其他进步的、健康的以及无害的文学，也为现代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彩。兄弟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理所当然地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长期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因而在文学史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反映，这有待今后的改进与补充。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本世纪初在祖国大陆发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和不久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被日寇占领的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共振。在其思想文化领域内也经历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台湾新文学的

莫荏人蔡和其他作家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是我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呈现出如此丰富、生动、多角面的主辅相成的构架，表明它具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特点，这在世界进步文学中也是颇具声色、颇为罕见的。中国广大作家群在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风雨共济，一展才华，使新文学园地绽出多姿多彩的苑卉。

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的产物，还是对我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特别是旧民主主义文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革命对封建文学发动猛烈进攻，在理论上甚至有对过去的文学全部否定的偏向，但事实上，过去文学中的民主性精华，都对新文学的萌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至于宋元的话本，明清的白话小说，以及晚清在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更可以看作是“文学革命”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一时代要求的先声。总之，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文体形式、创作手法以及白话口语的运用上，“五四”新文学是对历代文学中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不取决于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文学本身发展规律之必然。诚如鲁迅所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有着一个继承的系统，还存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②，是中、外文化相撞击的产物。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的激荡，一批知识界的先觉人士开始了介绍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外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工作，如周桂笙、徐念慈、王国维、马君武、苏曼殊、伍光建等人，即是西方美学著作、文学著作的最初介绍者。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刊物《小说林》、《小说月刊》、《小说时报》等也开辟了刊载译作的园地。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林纾在译介外国文学名著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位不识一个外国字的光绪举人，与熟谙外语的合作者密切配合，自1898年起先后译出了英、美、法、德、俄等十几个国家的一百七十多种作品，共二百七十多册，被世人称之为“林译小说”。以林琴南的翻译系列工程为代表的晚清民初翻译小说给新文学的先行者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等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对新文学的诞生发生过很大作用。

作为新文学起点的“五四”文学革命，其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大量介绍外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骨干，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外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田汉、刘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形成了一支力量可观的“拿来主义”者队伍。他们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莫不受到外国文化思想如进化论、泛神论、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的影响。“为人生派”的艺术，“为艺术派”的艺术也都渗透着外国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基因。鲁迅谈到他最初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①。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名篇，受到过果戈理、安特莱夫、显克微支、夏目漱石、屠格涅夫等作品的影响。郭沫若的生活道路和诗歌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影响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总结自己的做诗经过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德式了”。^①由此可见郭沫若受惠于外国诗歌影响之深。郭沫若整个创作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文学的影响。“为人生派”的代表作家茅盾同样重视并热心于外国文学的“引进和移植”，他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卓有成效的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者之一。其他如郁达夫、冰心、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等等，都受到过外国文学的滋养，也都为沟通中外文学的交流做出过贡献。

还必须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大约在1928年以后发生过一次总体上的“转向”，即由以前的主要面向西方转到主要面对苏联文学。这是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紧密关联的，是为中国当时革命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维支的《铁流》、草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等名著，陆续被译介过来。与此同时，出现了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热潮。这，一方面是为了供一般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作家和文学青年提供学习的材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译介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更为壮观。但，即使是革命文学作家，他们在大力向苏联文学吸取营养的同时，也没有怠慢了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斯汤达尔、狄更斯。总之，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三十多年的现代文学，呈现出向世界文学多方位、多系列、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状态。借他山之石，用之攻玉，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它为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以及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首先与以文言为形式的封建文学进行了斗争，接着又粉碎了“学衡”和“甲寅”等封建复古派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

的进攻。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学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要不要反对、清算封建文化等重大问题上。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文化新军的有力反击下，封建复古派一败涂地。虽然在以后的某种适宜气候下，死灰时有复燃，沉滓或再泛起，但已成不了气候了。而文学革命顺应时代的要求蓬勃发展如旭日东升。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革命文学还先后对国民党御用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艺”等进行了斗争。由于对方代表的是反动的、没落的、垂死的社会势力，只能替主子“尽些进丧的任务”，结果都被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运动席卷冲刷而去。

表现出文艺思想斗争复杂性、长期性、多变性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体系的较量。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不仅在中国的政治革命中随着不同的阶段和时期而有不同的表现和演化，而且，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其政治上的两重性也根据不同的情势，表现出文艺思想的不同形态和特点。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率先发难，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当文学革命深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传入中国并被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的情况下，他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使他首先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来终于退出了《新青年》，走上了极右的买办文人的邪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封建文化方面尚可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占领文坛正统地位而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惶恐、恐惧、仇视，要起来坚决反对了。1928年以后持续了数年的革命文学与“新月派”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论争、对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的论争，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几场论争的实质是承认不承认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人性论”者和“文艺自由”论者都企图

通过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从而达到诋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目的。从政治原则上讲，这种观点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但就其具体的人来分析，情形又各不相同。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是历史的沉积于无产阶级革命勃兴时期再次泛起于文学上的反映，这是在历史大变动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必然出现的动向。正因为他们是在逆流而动的，所以“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而且自相矛盾。在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阵营的批驳之下，他们只好偃旗息鼓，以败北告终。

此外，文艺思想的论争还表现在新文学阵营内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36年发生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都是在大目标一致、整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不同思想认识、观点以及方法的论争。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重要文章中针对革命文学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所阐明的许多理论、观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富有指导意义的。1942年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整风运动，实质上，它是对新文学诞生以来作家思想（包括文艺思想）改造的一次深化和检查，是一次集中的、系统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融汇的高度，为新文学二十五年来发展、斗争历史做出了科学的总结。《讲话》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树的一座丰碑。

文艺大众化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文艺民族化的内容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成为一种运动实际上贯穿于始终。“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萌芽和开端。白话战胜文言成为作家创作的语言，文学形式的革新，文学内容的肯定人的发现和人的管理，“乡土文学”的大量问世，以及大批作者群的

出现等等，使新文学带着新鲜活泼的风采朝着文艺大众化的方向迈进。

三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文艺大众化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被广大作家所重视，展开了三次讨论，形成了运动的高潮。由于“左联”的领导，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积极参与，三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具有理论的深度。论者从文艺大众化的阶级内涵、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的任务、途径和作者的修养等方面作深入探讨。讨论中还提出了建设“普罗大众文艺”的问题，并就内容形式、语言、技巧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说明。“左联”时期开展的这一场持续数年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将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进行的。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制统治，限制了作家迈向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步伐，致使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切实付诸行动。

抗战期间，文艺大众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民文艺的新风貌。群众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了解放区文艺的显著特色。中国真正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民主的时代，才能得以顺利发展。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讲话》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不但是对文艺大众化的丰富内容进行了本质的说明，还为建立人民大众的有民族独创性的新文艺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型特点，形成了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各种方法流派互相交融的状态。最早崛起的以鲁迅、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为人生”派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为艺术”派，形成了新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潮。由这两大主潮掀起的文学浪潮在当时造成了蔚为壮观的场面。究其实质“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产生的现实背景是一样的，对现实所持的不满态度也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反映现实和表达态度的方法不同罢了。“为人生”派偏重的客观描写需要的主观感受为基础；“为艺术”派推崇的抒写内心又要以客观体验为依据。二者都要以生活为基础，因而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在新文学的创作中常常发现人生派的作品中有浪漫主义因素，艺术派的创作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同步性、交融性的反映。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毕竟是两大流派，各自有着鲜明的特征。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新文学进入它的发展期以后，又涌现了许多流派，但只须认真考察，这些各具特色的创作流派之间，它们与两大主潮之间均有着内在的联系。二十年代的“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三十年代的“象征诗派”以及心理分析小说派、自叙体小说派、神话历史小说派等，受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很大，因而形成了以抒写自我感受，表现意象、意识流、意念、情绪为特征的“主情”风格。而“语丝”派、“乡土文学”派、早期白话诗、红色鼓动诗、“七月”诗派、赵树理小说派等等，在创作方法上更多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现实主义流派还是浪漫主义流派，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交融、互相借鉴的，而且两派都程度不同地吸取了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将西方的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手法“拿来”融进创作过程，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都实行着创作方法上的“融汇”论，

都是“拿来主义”者，他们在沿着某一主潮方向前进的时候，不放过任何于己有用的养料。这样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现代文学作家队伍。

中国现代文学确是一座弥足珍贵的丰富多彩的宝库，而且是世界性的。鉴赏它的“美”，发掘它的“真”，体味它的“善”，探索它发生发展的规律，吸收有益的思想艺术营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提供借鉴，是今天学习现代文学的目的。

为了便于学习、掌握现代文学博大的内容，探索它三十二年的发展轨迹，将它的发展历史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一、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

——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二、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

——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和发展

三、抗战前期的新文学（1937——1942）

——抗战文学的勃兴和发展

四、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文学（1942—1949）

——解放区文学的深入和国统区文学的发展

须略加说明的是，任何历史分期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切割完整的，一个文学运动的演化过程也不会是直线向前的。

何况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除主潮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流程和派别，上述分期的概括与历史涵盖仅就新文学的主导流向、主要发展阶段所做出的大体界定，绝非教学意义上的绝对值。

我们认为，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及其变革有着必然的关联，它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晦，总要形象地表现“人”所生活的空间、时间、环境，从而使它具有无可逃脱的时代性，现实性，这就决定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不可避免地和社会革命的发展阶段有了大体一致的指向。但是由于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如形象性、透视生活的多维角度、反映

生活的能动性、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形象塑造所需的历史沉积度、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由简单到复杂、艺术技巧由粗糙到圆熟等等，又决定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有自己的内在线索。因之，从时代性的总体指向出发，实事求是地，具体恰切地分析说明文学的这一历史指向中的表现形态，演化发展过程，从文学与时代既相依存又有独立性的辩证关系中，相宜地划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我们构想的出发点。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1
第二节 1921年后文学革命的深入	10
第三节 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18
第二章 文学创作概况	24
第一节 诗歌	24
第二节 小说	32
第三节 散文	37
第四节 剧作	41
第三章 鲁迅(上)	46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46
第二节 《呐喊》、《彷徨》	54
第三节 前期杂文	72
第四节 《野草》与《朝花夕拾》	76
第四章 郭沫若	83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道路	83
第二节 《女神》	92
第三节 《星空》、《前茅》、《恢复》及小说	101
第五章 重要作家作品	108
第一节 叶绍钧的创作	108
第二节 冰心的创作	116
第三节 朱自清的创作	122